

秦都咸阳相关问题探讨

时 瑞 宝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陕西咸阳, 712023)

提 要 本文着重讨论秦都咸阳的辖域及城市功能区域分布等问题。以往人们受《三辅黄图》记载的影响,认为秦都咸阳与内史的辖域是重叠的。本文运用文献及出土陶文资料,力求说明秦都咸阳的辖域仅限于大约一个县的范围,骊山一带也在秦都咸阳的辖域之外;20世纪50年代末发现的秦咸阳一号建筑遗址,长期以来被看作是秦咸阳宫的一部分,或者被看作是冀阆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该遗址遗存迹象的分析并结合对咸阳原上下地形地貌的观察,提出头道原是官署区,二道原是宫殿区,渭北岸坡是平民居住区的新观点。

关键词 秦都咸阳 辖域 功能区域

一 咸阳的城市范围

古代文献对秦咸阳城市规模、辖域范围的记录比较零乱,使人对这个问题难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如果说《三辅黄图》对秦咸阳的辖域范围有所交待的话,倒不如说人们因此而更加迷惑了。《黄图》云:“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户、杜,东至河,西至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王学理先生认为,《黄图》所说咸阳的范围是秦咸阳的远郊地带和京畿重地^①,这大致是对的。但问题在于《黄图》所说咸阳的范围与内史的辖域是重叠的,人们由此产生了对咸阳范围认识上的偏差,如何汉南先生认为,“秦之咸阳向北包括有今天的乾县、礼泉之地”^②;王学理先生在《秦都咸阳》一书中将骊山一带也归入“保存至今的咸阳文物遗迹”之中^③。由此看来,对秦咸阳的城市规模、辖域及其与内史的关系有进一步廓清的必要。

1. 咸阳的城市规模

咸阳在渭水以北有宫殿区、官署区和平民居住区(含作坊区)等。在渭水以南有阿房宫、兴乐宫、信宫(极庙)、甘泉宫、章台和上林苑等组成的宫庙园林区。上述这些分布较集中的建筑物和园林等即是秦咸阳城市的实际建成规模。当然在渭北还应把兰池算在内。如此,作为一个城市的秦咸阳,其四至大体可以勾画出来:北至望夷宫,地在今底张镇畦村一带;南至上林苑,以终南山为界;西界在渭北至杜邮亭,地在今渭城镇龚家湾一带,在渭南至上林苑西端,地在今周至县终南镇一带;东界在渭北至泾渭之交(含兰池),在渭南至上林苑东端,地在今西安东南曲

① 王学理:《秦咸阳——一座跨时代、超规模的历史名都》,《泾渭稽古》1995年2期。

② 何汉南:《咸阳附近地名略考》,《泾渭稽古》1993年2期。

③ 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95—206页。

江池一带。需要说明的是:一、《三秦记》对兰池规模的记录似有夸大,所谓“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云云,整个关中东部都成了泽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说兰池是泾渭交汇处形成的一个较大的水面倒是可能的,因此笔者把它看作是咸阳在渭北的东界。二、秦咸阳在渭北的西界的确定主要是以城区和陵墓区的界限来划分的。陵墓区的安排或可作为确定城市范围的佐证。在渭城区周陵中学北面有秦公陵(惠文王)和永陵(悼武王)等陵墓,宋以来树立的碑石均以此作为西周文武成康等王的陵墓,这种说法在解放后被推翻了^①。唐及其以前的文献如《括地志》《皇览》等均记其为秦陵。这里在秦咸阳中心区牛羊村西南约15公里,其东南以龚家湾为界,在任家嘴、塔尔坡等地已发掘春秋至秦的小型墓600余座^②,足以证明龚家湾以西为纯粹的陵墓区。在龚家湾——任家嘴以东,也有平民墓葬分布,如以黄家沟为中心的另一个平民墓区^③,但其密集程度似不可与龚家湾——任家嘴——塔尔坡这一区域相比。这种现象反映出秦咸阳建筑物呈散点式分布,并无明确城郊界线的真实面貌。

2. 咸阳与内史的关系

咸阳及其近郊是咸阳令的辖区,其范围大致是方圆百里,是秦设县的面积标准。《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出了这个范围,咸阳令就没有管辖权了。咸阳周边各县统辖在内史之下。《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京师意指首都及京畿之地,《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本秦京师为内史。”由此可见,内史辖域大体包括整个关中地区。内史辖域,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设县较多,计有长安、户、杜、白水、郑、栌阳、高陵、蓝田、泾阳、武功、陈仓、好畤等近20个县^④。咸阳成为国都后,是称县、称市或称作其它什么现在虽不清楚,但还是隶属于内史。咸阳的行政首长称令,如赵高之婿咸阳令阎乐。令只能是对人口较多的县的行政首长的称谓^⑤。县之上有郡,郡有郡守或太守,与内史大体是平行的。内史为职官同名^⑥,既是地域名,也是行政首长名,如内史腾^⑦,内史蒙恬等^⑧。汉景帝时把内史一分为二,有右内史、左内史,汉武帝把右内史更名为京兆尹,把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分别管理长安和京畿之地^⑨。

3. 从陶文看咸阳的范围

咸阳在行政区划上的范围所指大致是明确的,不仅如此,在秦人的习惯和意识中,咸阳也仅指咸阳城市及周围较小的一个区域,而不是把内史之地都叫咸阳。大量的秦代陶文可资证明。秦咸阳发现的陶文,有的是在咸阳后直接缀人名,如咸阳少申、咸阳巨鬲等,但多数都是在咸阳之后先缀一个更具体的小地名,表明制陶人在咸阳的具体住址,如咸阳市于、咸阳市牛、咸阳亭久、咸阳成申,这里的市、亭、成等字说的是咸阳的一个更具体的地名,这是很必要的,同在咸阳制造,又同在咸阳销售或使用的产品,因制造人所属机构或所居地址不一,有必要在产品

① 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② 王学理:《秦咸阳——一座跨时代、超规模的历史名都》,《泾渭稽古》1995年2期。

③ 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④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565—577页。

⑤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⑥ 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2页。

⑦ 《史记》卷《秦始皇本纪》。

⑧ 《史记》卷88《蒙恬列传》。

⑨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上把具体地址(机构)标示清楚以便区别,这也是产品质量责任制度(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要求。在秦始皇陵一带发现的陶文,情况就不同了。这里的工匠或工师是从各地征调过来的,在器物上只标示出来自何县(邑)即可,不必详示更具体的地名。袁仲一先生认为,在秦始皇陵生产陶器的工匠是以县(邑)为生产单位的^①,此说甚确。这里发现的50多件带有咸阳地名的陶文,均未标出更具体的地名,而是在咸阳之后直接标人名,如咸阳衣、咸阳野、咸阳午、咸阳庆等^②。还有来自咸阳周边各县的,如杜(西安东南)、栌阳、好峙(乾县)、美阳(武功)、芷阳(西安东郊)等,均标出了县名,并不与咸阳混同。来自咸阳的,因为到了外埠,也要标出咸阳。这说明,栌阳、芷阳、好峙等地,虽距咸阳极近,但在秦人的意识中,也不属于咸阳这一地名的涵盖范围之内。

不可否认,在咸阳之外也发现了标出咸阳具体地名的特例,如临潼上焦村马厰坑出土的陶罐上有“咸亭当柳昌器”陶文^③,上焦村76DM12号墓出土的陶罐上有“咸亭芮柳婴器”陶文^④。这种情况要做具体分析,像陶罐这种日用器皿,不能排除其在咸阳生产、在咸阳销售之后,由使用人带到异地使用这种可能性。

二 咸阳的城市功能区域

对秦咸阳的考古调查始于1959年,以后陆续对牛羊村北面的秦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由于没有获得过硬的实证材料,所以对这一组建筑物的属性到现在也没有达成共识。不用说,找到咸阳宫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几乎没有人否认咸阳宫城的曾经存在。人们一开始是被牛羊村北面的高出地面的建筑基址这样的目标所吸引,以为找到了咸阳宫,但又找不到宫城,郭城更是找不到。面对这种状况,我以为是到了重新整理我们的思路的时候了。

《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北陵所指,系二道原更合情理。二道原标高450~500米,比头道原高出约50~100米。视觉上的陵——高阜之地当指二道原。二道原是这一区域的最高处,因而咸阳宫才能“端门四达”,有如天帝的居处。《史记·秦始皇本纪》:“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六国宫室应是相互独立的六组建筑,头道原和二道原均有分布,比如在头道原的毛王沟、柏家嘴分别采集到楚、燕风格的瓦当,在二道原的怡魏村曾采集到齐风格的瓦当,这或许能够说明,“北坂”的范围也不独指头道原,还应包括二道原。

从建筑选址来说,把咸阳宫——朝宫——政治中枢放在二道原上,有借地势之高的取向,事半功倍。这一带在汉初被高祖、惠帝又相中了,营建了长陵(含长陵邑)和安陵(含安陵邑),咸阳宫的建筑物凡暴露在地面以上的部分均可能被夷平而挪作它用。人们已经看到,汉初的一些陵墓,其封土堆的包含物是相当丰富的。考古工作者探查咸阳宫的工作是否应当放在二道原上来?

二道原南面的头道原,在西起胡家沟、东到三家沟的区域内,建筑基址发现较多。对牛羊村

① 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53页。

② 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21页。

③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上焦村马厰坑的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④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陪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北面的一、二、三号遗址的发掘表明,建筑物规模较小,一号遗址的“主体殿堂”1室,面积为13.4×12米,其它房间面积更小。整体为三层楼阁式建筑。从各种迹象分析,与宫殿、冀阙之类都相去甚远(这个问题在本文后面述及)。在头道原南沿,聂家沟、胡家沟、刘家沟等处,由陕西省考古所发掘秦烧制建筑材料的官营陶窑14座^①。这些工场靠近官署区尚可理解,如果靠近宫殿区就不合情理了。

在头道原下是渭北岸坡地带。南北宽约2公里,地势平坦。在长兴、西龙、滩毛、店上、灰斗、仓张、孙家等处分布着密集的灰坑、陶窑、水井、陶水道和道路遗迹,砖、瓦、瓦当、日用陶器、铜料、铜渣、铜钱等大量出土,足以证明渭北岸坡地带是平民居住区和工业作坊区。渭水从古至今,在这一带向北推移是大家公认的,因而当时的闾里区比今所见要更大一些。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②,每户若按4人计,约有近50万人,加上咸阳原有人口,其数可观,因而咸阳的平民居住区当很大。平民居住区南北以渭水和头道原南沿为限,东西延展,头道原以上和渭水以南绝无城市性质的平民居住区。如果把咸阳宫放在渭北岸坡地带,从地理条件、安全防卫及政治取向等方面考虑,其合理性都是很小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秦咸阳在渭水以北依地势分为三个功能区域,即渭北岸坡平民居住区(含手工业作坊和市肆),头道原官署区和二道原宫殿区。渭水以南则是宫庙园林区。解决咸阳城市布局的焦点问题是如何探寻出咸阳宫城的位置,而寻找咸阳宫的时候,不应把目光仅局限在头道原及原下。

三 一号建筑基址的属性

秦咸阳一号建筑基址曾被认为是咸阳宫的主要宫殿之一^③,也有人认为它是冀阙之“西阙”^④,这是目前影响较大的两种观点。如果把这两种观点同遗址中的出土物和诸多迹象相对照,则有一些疑点值得人们来思考。

1. 壁炉的配置

在3、5、8三室各设取暖壁炉一个。3室是顶层的辅助性房间,与主体堂室1室不直通;5、8二室是中层的辅助性房间,中层的主体堂室是6、7二室。主体堂室均不设壁炉。这是一种很有规律的配置,反映出人们在主体堂室活动的时间较短,而在辅助性房间活动的时间较长。只有纯礼仪性质的建筑物可能才具有这种特性。

2. 窖穴的配置

一号遗址共发现窖穴7个,底部均遗留有动物骨骼。如果是为日常食用而冷藏肉类,有一两个窖穴就能满足。如果要应付重大的祭祀活动,7个窖穴也不宽裕。《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以牺三百牢祠雩^{即雩}。”《大戴礼》:“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一牢即是一头牲畜,祭祀用牲量之大可想而知。

在3号窖穴中出土了几包丝绸,可辨认出是衣裳的只有一包,其它为未裁制的面料。《周礼

① 赵荣、吕卓民:《秦都咸阳古窑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

② 《史记》卷《秦始皇本纪》。

③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11期。

④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43—47页。

。天官·冢人》：“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画布巾冢六彝，”这些丝绸可能是用来遮盖（巾冢）祭品的。

3. 排水池的配置

遗址共发现排水池 4 个，以位于 8 室内的第 3 号排水池为例，方形，长 3.20 宽 2.70 深 0.40—0.70 米，底铺板瓦，并设陶漏斗。如此大的排水量，不是日常盥洗用水量可比的。有人认为这是浴池^①，如果考虑到室内设置的肉品冷藏窖（J1），浴池之说恐怕就站不住脚了。排水池应是为冲洗大量肉品而设。

4. 击石的发现

遗址发现击石 28 块，系将鹅卵石一面磨光而成，大小以手握为宜。原简报将此定为磨石，有两点解释不通：一，原简报说用于打磨石料、木料面或地面。木面、泥地面用石料打磨，只会越磨越毛，与打磨者初衷相反；至于打磨石料，该建筑除柱础石外别无其它石件，柱础石也是未经打磨的天然石块。二，作为建造该建筑的工具之一——磨石，不可能长期放置在该建筑物当中。这 28 块石头可能是 14 对击石，在进行礼仪活动中作伴奏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掌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金有铎、钟、铃，土有缶、埙、甕，革有鼓，丝有琴、瑟，匏有笙、竽，木有柷，竹有管、箫，石有磬，可能还有这种质地粗劣、造形简朴的击石，简朴的乐器奏出的才是真秦之音。《史记·李斯列传》：“夫击甕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

5. 农具和纺轮的存在

遗址出土铁锄、铁耜、铁铲各一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对其存在没有予以诠释。但是不能回避的是，在宫殿、冀阙一类建筑物中，这些农具的存在显然有蛇足之嫌。如果出在祭祀土地神（社）的建筑物中则是合乎逻辑的。陶纺轮的存在也是同理。

6. 炊具与刀的存在

遗址出土陶甗、陶盆、陶钵等炊具和 4 件铁刀，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遗存迹象。原简报对其成因未予诠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号建筑遗址应是礼仪类建筑，很可能是一个祭祀场所。秦的祭祀对象很多，有天、地、白帝、上帝、青帝、炎帝、黄帝、蚩尤及秦之历代先王^②。不难想见，秦都咸阳的纯礼仪建筑也是很多的，这是人们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① 张厚埔：《由秦都咸阳一号建筑遗址看秦代卫生设施》，《考古与文物》1982 年 5 期。

②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94—96 页。

go on a punitive expeditions in some political regions of Zhou dynasty and whose power just lay between King of Zhou and other princes under an emperor. There are two channels in terms of Fangbo's formation: the first one was formed by being enfeoffed by rulers in Zhou dynasty e. g. the state of Qi; the second was the outcome of Fangbo's being powerful which presented a fait accompli, or it might be acknowledged by Zhou dynasty, e. g. the state of Chu and Xu. Fangbo system was practised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Fangbo policy in Shang dynasty. The occurrence of Fangbo system resulted in a three-grade structure (King of Zhou- Fangbo- nobles) of the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some area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owever, the academic circle hasn't given du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Fangbo 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for long. The unearthed inscription on Ni Zhong- - the revered Mr. Chu from the grave of Prince of Jin has provided valuable material for studying Fangbo 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the document, the article has made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Fangbo system concerning its formation, feature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Fangbo, King of Zhou and ordinary princes under an emperor.

4. Research on a Few Problems about Qin Capital of Xianyang (by Shi Ruibao)

This essay emphasises the controlled region of Qin capital of Xianyang and its function as regional layout of the city. Affected by the records of "San Fu Yellow Map", people considered that the controlled region Qin capital of Xianyang and Neishi was similar. The essay utilizes documents and unearthed data of inscriptions on pottery. It wants to illustrate that the controlled region in the Qin capital of Xianyang was only limited in a confines of a county approximately. The Lishan belt was located in the controlled region exterior of Qin capital of Xianyang. The No.1 construction site of Qin Xianyang found in 1950's late was looked as a portion of Qin Xianyang palace for a long period, or a portion of Ji Que. The essay proposes a new view that the first piece of terrace should be official bureau district, the second piece of terrace be a palace district, the northern slope of Wei River should be a lived district of the common peo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trace of the site combined a survey on the terrain of Xianyang plain.

5. A Study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Xining Wei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by Rong Ning)

The army and the populace that lived in Xining district 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Xining Wei during Ming dynasty. The population of the Xining district was only recorded by the encyclopaedia. But there was much problem in the record, so bring some difficulties on the local history research. The essay analyse and rectify the record of population in the encyclopedia.

6. Smoking Custom in China and Tobacco Spreading Way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by Tao Weining)

Tobacco is one of the industrial crops which was spread from America in the middle-later period of Ming dynasty. It was first brought to the coastal area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and then was spread to almost the whole nation by soldiers and businessmen. In